

# 中国文化 对日韩越的影响

朱云影 著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

# 中国文化 对日韩越的影响

朱云影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/朱云影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7. 9

ISBN 978-7-5633-6655-2

I. 中… II. 朱… III. ①中国—传统文化—影响—日本—研究②中国—传统文化—影响—韩国—研究③中国—传统文化—影响—越南—研究 IV. G122 K2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12235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  
网址:www.bbtpress.com)

出版人:肖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(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 邮政编码:101113)

开本:960mm×690mm 1/16

印张:31.5 字数:500千字

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 001~6 000 定价:46.00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一部传世的不朽之作

先业师朱云影孔泽先生，江西浮梁人，虽生于农家而有志于学问，在乡求学不足以符其所望，于青壮之年负笈东瀛，进修东西洋列国之史，为期八载（1929—1937），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，奠定深厚根基。以对日抗战军兴，返国献身于教育，以培训国家英才为志节，所施教与著述，皆古今中外关系之史也。其于学界之建树声名者，即在于熟知亚洲各国史志之书而立说有本也。

抗战胜利后，云影师即于1946年去台，1947年受聘为台湾师范学院史学教授。余于1950年考进师院，即列为门墙焉。吾因亲炙教诲，得窥夫子之学术，粗晓大略。

云影师生平重要著作为：《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》，于1981年刊布问世。为七百余页巨著。在史学之林，独具专门特色。论域广阔，涵盖古今历史上之邻邦文化关系。网罗宏富，内涵多样而丰博。具见史家功力与气魄眼光。行世近三十年，久已绝版，无从购求。

前于2005年冬间，曾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接手排印之意。因知余为朱云影师门人，电商出版其大作之意，求余代为联络。余以为有益今代学者之参阅，遂即向台北与朱夫子关系至好之王仲孚学棣商酌，夫子已谢世多年，务要与其家人联络，用以促成重印云影师大作。盖余蜗居加拿大，难于在台北奔走一切，特请仲孚偏劳。故凡一切中介两方，热心奔走者，仲孚所费心力不少，



直至2006年冬,出版之事乃成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取得朱夫子公子俞允,双方签订契约,遂得以出版之机。

云影师此一巨著,自信其学术贡献,自重其辛苦结集,故于刊行问世之际,撰写一篇自序,其中概括性列述所作六编二十篇以专门论题,介绍各项重点。既有云影师长篇自序,鄙人自无须再于此重述。但凡要略知全书梗概,应可据朱夫子自序考究线索。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经营云影师《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》之书,往返经年,附带搜辑有邱添生教授所撰《朱老师云影教授行谊》,由是于其书其人,可供世人察识原委,自亦可信朱夫子学问志节之坚毅,识见之超卓,立论之平实,以至积年撰著之匪易。鄙人亦将得诸君之前导,而可省略不少言辩。故特信编者吴晓斌先生之细心搜辑,以备读者参考。

本文不拟重述云影师在其自序中所提示的世界五大文化圈,可以算是世人周知的常识。朱氏之作,重点自是本之于中国文化圈而经营其大著之种种内涵。换言之,此书立旨,乃本之于中国文化圈,以布陈日韩越之所承中国文化影响。于此,我等应以严肃立场看待不同文化圈的意义。20世纪不止朱云影师看重文化圈问题。同时代中,较云影师年长几岁的英国大史学家汤因比(Arnold Joseph Toynbee),生平治史,完成重要专著《历史研究》(*A Study of History*)十一巨册。生平研究全世界各个不同文化体,大大小小不下六百余个。而汤氏所重视的重要文化体,则指出二十一个。在此二十一个文化体之中又分为两类。其中有十五个重大文化体是移植其他民族文化而派生传承的。另有六个文化体是自身独创而发展形成的文化体,即埃及、苏美尔(Sumer)、米诺(Minoan)、中国、恩第(Andean)和玛雅(Maya)六者。而其中有五个文化体早已消亡于前代。特要请国人留意的,就是美洲古文化之恩第、玛雅是自16世纪承受西班牙人入侵而招致民族灭绝、文化绝绪。上天不悯,世人不恤,真是人类中庞大浩劫,除了少数史家追考,天地似已见不到其千年缔造之文化成就。真可悲也。想自16世纪以来,亚洲亦与美、澳、非洲同其命运,沦亡之弱族小国,何止以千百计,在此狂风巨浪袭击之下,中国迄能幸存于世,则民族文化之厚基,前代国人之拼死抵抗,方有今日,国人应有明察,亦当引来比较,望多奋勉焉。

据汤因比研究世上独创之文化体,六种之中只幸存中国文化,汤氏大著俱

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,其本人亦病逝于1975年。对于中国文化之认识与评估,未尝有所轻视,观点未尝随世潮而改易,伟大史家正见识断精深定力坚毅。令人钦佩。

中国固有的两个思想制度,一个是王道思想,一个是中国与邻邦关系之封贡制度。这两个中国固有的思想制度,在此百年间极受诋议、批斥与讥讽。我自早注意到,我是审慎思考,拣取他人鄙薄而丢弃不要的论题,认真评估。

20世纪我国学人攻伐中国王道思想与封贡体制,大有其人,形成一面倒的唾弃余势,而却忽略弄明白中国古代王道内涵是什么。经鄙人研究,提出三个其中之重点。其一为国际关系王道思想。其二,即为《先秦两汉之生态保育思想》。其三即为《中国古代之开放关市与自由商旅思想》。

本文所需要引据的是《存祀主义与中国国际关系王道思想》,文中举实其思想自殷商武丁时开始,其建立制度,是自周武王克商之际开始,其内情不待多论。以免太占篇幅。

云影业师大著《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》,所叙重点包括古今文化关系,时代漫长邈远,下及明清两代,所见彼此文化关系之契合,尤在表现更为深入而具体,自不似一言封贡制度那样简单。世人更须用心研考。本人受教于朱夫子门下,得读“中国上古史”、“亚洲各国史”以及“史学通论”等课。然因其讲授“亚洲各国史”,重点放在各国本身之历史,未尝延伸一论彼此文化关系,故鄙人受学,并未能竟及云影师专门造诣之文化史关系。而朱夫子在经营编刊其书,鄙人已早赴香港任教。惟信夫子之作令人仰止。内涵之醇正繁富,可为不朽之作。吾为入门弟子,不能继承,亦当暴布作者用心,表暴师门卓识,以传示后世,供人参酌。

以旧世界时代言,中国之在东亚,有其辉煌文化建树,对于相近列国友邦有表率作用,其文化乃得输出而影响日韩越。但凡日韩越之知书文士,多能做中国诗,写中国字。此其容易而累积于历年之深相爱好,朱夫子所言及各国国人自著之中文书甚多,与中国声息相通,真是不易,值得珍视。此风实是延伸至20世纪。吾读越人中文之书,系当1880至1884年间越南受法国入侵而到华求助的《越使阮述日记》。为陈荆和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所印出之《阮述日记》,可证其国官绅多能以中文著书。我曾为陈荆和教授校订核对。斯书中陈



教授亦附陈其事。吾因编辑清人盛宣怀家藏文献，曾亲手处理日本学者冈千仞（鹿门）游访盛氏苏州留园，并校订冈千仞与盛氏笔谈。冈氏父子俱通中文，而冈千仞则能做中国诗。我亦曾因编辑盛宣怀文献而收辑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甲午战争时韩臣南英哲向中国之乞援，俱能证明日韩越官绅文士多精通中文。惟至 20 世纪以来，此情已渐次消灭，几至完全终止。

我研治历史，相较我国历代文化风气，可以很悲观而肯定地说 20 世纪是中国人对内忧外患中度过的、缺乏自信心的世代。百年来一意要打倒旧文化，吸收外来文化皮毛，充分自信，以为领导方向表率群伦。自高自满，打倒旧固，低首下心吸纳西方文化。尤其丑诋古人，抹杀历代文化成绩，要彻底攻伐毁弃固有文化，形成风狂运动。又以先驱自命，视为不世之功。此在学界、文界、史界所见，甚是广泛普遍。学者何不据现存史料细心研考之。

想想 20 世纪以至跨入今代，自 1930 年代以来，打倒、破除中国文化之运动何时稍歇。台湾方正大力进行去中国化，实欲连语言文字而终止之。既然中国人自己如此不爱护不珍惜自己文化，岂能尚要祈盼日韩越之人会热爱中国文化？你自己都已唾弃毁坏，岂会再谈什么对他国影响？因是可知云影师之作已是今代绝学，保留详备纪录，供世人参考回思而已，其书固自更见可贵可珍。

中国历史上发展，虽自有文化创造，亦并同时不断吸收其他文化优点，自汉代特别是唐代，俱能自然吸收中亚文化，特别显著者是佛教文化，但凡经过长期消化酝酿，俱能表现中国特色，像佛教各宗派早已绝然不同于印度，而因应佛教创生道教，自更是独具一种宗教。其他若沿边民族如满蒙生活服制亦并充分吸收，音乐中之琵琶来自西域，器用中之景泰蓝，仿自欧洲，但经中国吸收酝酿，独创中国风格，实已超越原产地，中国人之智能是可以信赖并具自信的。却有一点要说明，不是要把中国文化完全打倒，就能有资格作文化融合，此是文化虚无主义，可惜 20 世纪之国人，饥不择食的乱加模仿引进，生吞活剥，取其皮毛，以为得计。样样俱学，却并不真懂，由是东取西改，朝取夕弃，张皇追逐，劳民伤财，而其贫弱又丧失文化如前。吾故谓 20 世纪乃中国人有信心的一个世代。你既然东取西采，一味效仿他人，那日韩越的人士谁会再看重你。所以这段史纪自然戛然断绝以终。以后的日子仍要看国人争气不争气，最重要是有无自信心，有无自爱文化之心。世上千万民族，似未有像 20 世纪中国人之

仇视古人，打倒传统文化，如此自轻自贱自渎自伐者。此是亡国灭种之兆，盼国人醒悟吧！

云影师此书之作，足以让国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有更清楚的认识和自信，而此书得以在内地再版印行，使学术界与广大读者有机会认识云影师的大作和生平，令人感到欣慰，吴晓斌先生函电往返联系之功尤不可没，在此谨申感谢。

受业门生王尔敏

2007年4月5日

谨序于台北之善刀书屋



## 朱老师云影教授行谊

朱老师讳云影，字孔泽，江西省浮梁县儒林乡人，生于1904年阴历六月十五日。朱师自幼失恃，幸赖两位姊姊照拂成长，而家中世代务农，以植茶为生，平日协助家人勤于田间农事，未能进入正式学堂接受中小学教育，但却一心向学，乃借着伯父的资助，得以奋发自学，终于考取江西第一师范学校，毕业后曾经加入国民革命军北伐行列，旋又考取公费，负笈日本。自1929年4月至1934年3月，就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，接着自1934年4月至1937年3月，就读京都帝国大学，专攻东洋史及亚洲史。京大毕业留校任教时，与樊冠华女士结婚。不久，适逢卢沟桥事变发生，因曾率领当地中国留日学生抗议，而被日本军国政府遣返中国。

朱老师离日返回中国，正值中日战争全面展开之际，先后担任各项要职，计有：之江文理学院教授（自1937年8月至1938年7月）、日本评论社编辑部主编（自1939年2月至1941年4月）、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部编审兼主任（自1941年5月至1943年7月）、鲁苏皖豫边区学院文科教授兼科主任（自1943年8月至1944年7月）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（国际）研究室同少将研究员（自1944年8月至1946年7月）。在这段期间，朱师正值青壮年时代，满怀强烈书生报国的雄心壮志，每以慷慨正义的文笔谴责正在疯狂肆行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，所著《日本必败论》一书（重庆市，中国文化服务社，1940年出

版),即大大地鼓舞了抗战时期的民心士气。尤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职时,朱师以其优异的日文学养,专门负责对日研究,翻译各种相关情报,直接呈报蒋委员长,颇有助于研判对日抗战的策略;迨战争末期,又将《对日招降书》、《抗战胜利宣言》等译成日文,空投日本东京以及中国抗战沦陷区,震撼了日本军心。

朱老师于1946年夏天去台,是年8月至翌年5月止担任台湾省编译馆编纂兼主任,自1947年6月起转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(按:其后于1955年6月改制为大学,又于1967年7月改制为台湾师范大学)史地学系教授,并曾一度兼代系主任。1962年,史地学系分为历史与地理两系,朱师膺任首任历史学系主任(自1962年8月至1965年7月),并讲授“史学方法”、“中国上古史”、“亚洲各国史”等课程,授课之余,更潜心研究,著书立说,成果斐然,于历史学界享有崇高荣誉,备受尊敬。1970年,在朱师多年精心擘画之下,又创立了历史研究所,并出任首任所长,不仅为史学研究开拓专业领域并提升学术水准,而且还在培育史学专才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,如今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已经深受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肯定。

朱老师于1978年8月届龄荣退,唯仍应聘在系上兼任,讲授“史学方法”一门课程,直至1982年11月,始偕同师母赴美依亲,定居于加州的佛雷斯那城(Fresno),与公子朱海若、媳妇吴楚翘、孙女朱华凤、孙儿朱华龙共同生活,安享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,同时也寄情于田园山水之趣。1987年12月师母因病辞世之后,朱师更是全心照顾孙儿女,直至1995年1月27日(美国时间)于午睡中安然离世,寿终正寝。

顺便借此机会,拟就个人追忆所及,缕述朱老师令人印象深刻而怀念不已的二三往事,俾能更加具体地了解朱师一生行谊的点点滴滴。

其一,治学态度严谨踏实:朱师受过严格的史学研究训练,又拥有高深的学术造诣,更具备长远宏观的卓越见识。在讲授的每一门课程,都备有亲自编撰系统分明而且内容充实的讲义,于课堂上更随时配合所讲的主题,补充许多相关基本文献最新研究成果,尽管朱师乡音很重,但是只要专心聆听,则在每次上完课后,都会有满载硕果而归的感觉。此外,由朱师陆续发表之20篇系列论文汇集而成的专书《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》(台北市,黎明文化事业公司,1981年4月初版),实为一部义例精深、史料宏富、见解创新的高水平学术



巨著。我个人对于朱师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，由衷敬仰钦佩，并一直引为砥砺自己努力的典范，而事实上，我于台湾师大毕业以后，留任母系助教，旋又考取日本国公费奖学金，并决意选择前往京都大学继续深造，可说完全是受到朱师的鼓励与影响。

其二，提携后进不遗余力：朱老师治学严谨，教学认真，固为众多学子门生所熟稔，而对于后进的奖掖提携，也是一向不遗余力，如今仍在母系任教服务的老师同人，大多身受朱师的敦诲或启迪，尤其是在有关薪火相传的专业课程人才培养方面，朱师似有周延妥适的规划，亦显示坦然率直的胸怀。例如于1973年夏，即将“中国上古史”课程交由王仲孚教授接任，又于1982年冬举家赴美依亲之时，则把“史学方法”课程交由我接任，并在次年7月27日特自美来函，殷切叮咛，勗勉有加，函云：“贤弟天赋过人，又能自强不息，在史学上将会有重大建树，当可预卜！‘史学方法’由贤弟担任，至为理想。本来中国史学在世界各国中起源最早，亦成就最大，两三千年来，先贤不断讲求方法，如训诂、校勘、考据，皆有极重大之成就，较之西哲所提内考证、外考证，实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故讲史学方法，应中西兼顾，取长补短，固不可故步自封，排斥新潮，亦不应盲目崇洋，数典忘祖！盖方法必须与固有学术相结合，否则只是空洞的教条而已。不知贤弟以为如何？”十余年来，我自觉惭愧在史学上竟仍乏善可陈，但却自信始终秉承师训，未尝片刻或忘，朱师所撰讲义的可读价值也历久下变，因而仍然发给学生参考。

其三，名位利益淡然处之：母系由史地学系转为历史学系乃至增设研究所，朱老师一直在这块史学园地默默耕耘，牺牲奉献，垂三十余年，尽管其间有筚路蓝缕之功，却从不借此刻意追求名位利益。例如1962年，膺任首任历史学系主任，等到整个系务已经奠定基础且具备规模之后，遂即辞卸主任兼职，改请戴玄之教授继任；同样的情形，于1970年历经缜密规划而创办历史研究所，并出任首任所长，同时又延揽甫自德国留学返回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研究所原职的系友李国祁教授前来母校历史研究所专任教职，翌年所务大致就绪步上正轨之后，遂即坚辞所长而改由李教授继任。凡此，充分显示朱师豁达大度的胸襟，以及奖掖提携后进的情操。再者，朱师于大学部授课所编撰的各科讲义，系统分明，内容充实，当时曾有许多书店书商以极其优厚的利润洽请出版销售，朱师却认为将会增加学生购书负担而断然拒绝，其淡泊名利的风

朱老师云影教授行谊

格,于此可见一斑。

综观朱老师云影教授的一生行谊,可谓诚朴谦逊,奉公守法,热爱国家,潜心学术,而其淡泊明志,高风亮节,永为门生景仰,子孙缅怀。

邱添生

1998年11月15日

于台湾师大历史学系

## 自序

今日大家都在高谈中国文化,其实中国文化的价值,应该从各种角度来观察、衡量。语云: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中国文化的价值,单从中国史方面看,似乎还有不足,如果从环绕中国的邻国史来看,可能显得更突出。所谓中国文化,涵盖的范围,并不限于中国境内,实指以中国为中心,日韩越各国受其光芒辐射而形成的一大文化圈。中国文化圈,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、东方正教文化圈、伊斯兰教文化圈、印度文化圈,号为世界五大文化圈。但关于中国文化圈的内容,一般似乎仅有模糊的零星的认知,虽然也有些学者,就中国与某国间的某种文化关系加以研究,而根据中日韩越各国的原始文献,从各种角度上下数千年做系统的综合研究,以求了解中国文化圈之全貌的,无论中外,似乎尚无其人。这是一件千头万绪的拓荒工作,著者不自量力,在“国家科学委员会”的连年奖助下,尝试此种研究,达十七八年之久,如能多少帮助世人认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历史地位,那就是著者最大的心愿了。

本书所用资料,主要是日韩越各国的汉文文献。原来日韩越各国千百年来通用汉字,所以历代留下了许多汉文撰写的各种史书,如日本的《日本书纪》、《续日本纪》、《本朝通鉴》、《大日本史》、《日本外史》等,韩国的《三国史记》、《高丽史》、《东国通鉴》、《燃藜室记述》、《李朝实录》等,越南的《大越史记全书》、《越史通鉴纲目》、《历朝宪章》、《大南实录》、《国史遗编》等,这是东方史料的一



大宝库。可是今日那些汉文文献，却多被束之高阁，因为日韩越各国，已限制汉字或废止汉字，各国青年已无法读懂汉文，而各国学者能读懂他们祖先著作的，恐怕也已不多，即使有相当的汉文修养，由于民族意识的作祟，也未必能做客观正确的利用，而西方学者限于客观条件，似乎也很少注意及此，至于中国学者，一向漠视那些汉文文献，当然更谈不上利用那些汉文文献做系统的综合研究。胡适之先生曾指出中国近代新史料的八大发现，<sup>①</sup>如果照胡先生的说法，这似乎也可说是八大发现之外的又一发现。

本书所用方法，主要是比较法，尽量利用中日韩越各国有关的史料，做系统的比较研究，包括甲国史料和乙国史料的比较研究，官方文书和私家撰述的比较研究，地下史料和纸上史料的比较研究，原始文献和近人著作的比较研究。关于近人的著作，我们不能不采取特别谨慎的态度，因为近人的著作，难免多少混入近代的观念，改变原始文献的面貌，何况民族主义泛滥的今日，难保不会有意或无意地隐匿证据。我这一系列的专题研究，都是采取独自的立场，既未依赖前人，亦未依赖外人，务求以冷静的态度检讨历史事实，每一论点，都尽量引用日韩越各国的原始文献作证，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，极力避免无稽的游辞，期能符合历史求真的目的。

本书系由专题论文汇集而成，合之为一系统著作，分之为二十篇专题论文<sup>②</sup>。全书共分六编。

第一编学术，包括论文四篇，分别检讨中国史学、经学、文学、科学对日韩越各国的影响：

就史学言，中国史学的几点特色，都在日韩越各国一一重现，如中国的史官制度，给各国树立了先例，使各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记录；中国富有变化的史体，启示了各国史学多方面发展的途径，所以各国纪传、编年、纪事本末以及政书、实录等史体，应有尽有；春秋褒贬劝诫的书法，使各国也以垂训借鉴为历史第一义，鼓励了各国历史学家追求历史的“善”更过于历史的“真”；春秋别内外的精神，唤醒了各国的民族意识，也刺激了各国迎头赶上先进国的欲望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见王彦威著《清季外交史料》胡序，胡先生在序文中以日本旧藏中国古籍之公开，列为一大发现。

<sup>②</sup> 以下所述，部分系用黄秀政君之文，黄君原文“评介朱著《中国文化圈之历史的研究》”，载《“中央日报”·副刊》1975年5月1、2、3日。

就经学言,当日韩越各国还在原始的无组织状态时,接触了中国的经学。经学的内容,小而个人修养、家族共处的方法,大而国家天下长治久安的道理,以及各种社会规范,可说无所不包,这恰好给日韩越各国提供了一套秩序,所以很容易在各国生根、发展,逐渐奠定了各国传统文化的基础。至于朱子代表的宋学和清代的考据学,对于各国近代学术界也曾分别给予相当的影响。

就文学言,日韩越各国千百年来,一直通用汉字,虽然曾分别自制文字,但知识分子并不乐于使用,仍始终利用汉文为抒情写意的工具,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作品。过去各国的文学,无论形式也好内容也好,都可说是中国文学的模拟,各国诗文派别的消长,也和中国有密切的关系。由于各国过去文坛以汉文学为主流,所以各国虽有若干用自制语文撰写的作品,除日本略有例外,似乎多不为高级知识分子所接受。但是到了近代,由于民族主义的狂潮,各国国文学逐渐抬头,恐怕汉文学将只有渐被遗忘,成为历史陈迹了。

就科学言,中国科学——天文学、历法、算学、医药学等,在明代以前实有辉煌的成就。天文学方面,中国自古保留丰富的天象记录,世界任何国家都无与伦比,历代天文学家辈出,如京房、虞喜、张衡、李淳风、郭守敬等,都曾有极大的贡献。所以日韩越各国的天文知识,无不从中国传播而来。历法方面,各国一向采用中国历,随着中国历的变换而变换,如《麟德历》、《大衍历》、《宣明历》、《授时历》、《大统历》等,都曾先后被各国采用,尤其《宣明历》,日本一直沿用了八百余年,韩国也沿用了五百年。算学方面,各国因征收租税和丈量土地必须借助算学,所以都模仿中国,设置算学博士,以中国算经《周髀》、《九章》、《海岛》、《缀术》等为教材,教授生徒,并设算科,考选算学人才,元朝又发明了算盘,很快也传入了各国。医药学方面,我国先秦的医药知识,已经相当进步,医在周代似已成为专业,春秋时医术已开始分科,尤其到了汉代,华佗精于外科,发明麻沸散作麻醉之用,实非同时代任何国家的外科所可梦及。本草之学,殆亦兴于汉代,《神农本草》当完成于此时。唐高宗时,刊布《新修本草》,这是我国最初的法定药典,比西方最初的巴塞罗纳(Barcelona)药典要早八九百年。至明代李时珍著《本草纲目》,已经不是单纯的药物学,进而带有博物学的性质了。由于中国医药学的优越,所以受到各国的欢迎,各国在西医传入以前,千百年间完全依赖中医,常设法来华学习医术,收购医书,中药也完全仰给于中国,就在西医传入后,中医也仍与西医并行了一段时间。



第二编思想,包括论文五篇,分别检讨中国儒家思想、政治思想、法先王思想、正统论、华夷观念对日韩越各国的影响:

就儒家思想言,儒家强调正心修身的政治思想,重农节约的经济思想,重视人伦的社会思想,侧重人文的宗教思想,都曾在各国见诸实施。各国根据儒家经典,或强调实行仁政,或采取劝农、节约政策,或提倡三纲五常,或据孔子“不语怪力乱神”的思想排斥异端妖术等,不一而足。

就政治思想言,中国先哲的基本政治思想,如敬天、修德、尊贤、正名等,都曾深刻地影响日韩越各国的政治。翻开各国的史书,关于灾祥的记载,触目皆是。这是因为中国先哲认为天人相应,天心反映民心,灾祥乃上天对统治者示意。所以各国统治者每因灾荒而下诏罪己,刷新政治,或大赦改元,或为了攘灾而修德,下令开仓救济,蠲免地方租税。可见此种思想,实有限制王权的作用。至于尊贤与正名的思想,如《尚书》“任贤勿贰,去邪勿疑”,《论语》“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”等格言,常为各国官文书再三引用,其鼓励统治者用贤才,去奸邪,警告野心分子尊重大义名分,对于各国吏治的澄清与政局的稳定,显然曾有相当的贡献。

就法先王思想言,中国先哲“言必称先王”,每有某种理想,便假托之于先王,以期增加其学说的分量,儒、法、道、墨诸家都是如此。他们把先王塑造成完美无疵的典型,作为后人施政、执法、用兵、设教取法的对象。日韩越各国的执政者,亦皆以中国文献上传述的先王视为最高楷模,所以先秦哲人倾尽才智寄予先王的某些理想,得有多少见诸实施,这显然有助于各国政治社会的进步。

就正统论言,中国先哲一面强调“天无二日,民无二王”,一面强调“辨华夷,别内外”,这也就是春秋标榜的尊王攘夷思想。日韩越各国都曾深受此种思想的影响,如日本的大化革新、明治维新,都是由于受到此种思想的刺激;韩国则一向视尊王主义为大一统主义,视华夷之别为文野之别,所以过去特别亲中国,自视如周之诸侯;而越南之脱离中国而独立,民族意识的觉醒,亦皆由于此种思想的启发。可见正统论不但加强了各国内部的向心力,也鼓励了各国发愤图强的精神。

就华夷观念言,如《论语·八佾》:“夷狄之有君,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”《公羊传·成公十五年》:“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,内诸夏而外夷狄。”都可证明先哲如何重视华夷内外之别。不过先哲的华夷观念,似乎重视文化的意义高于种



族的意义。所以孟子主张“用夏变夷”，就是认为借文化的提高，可使夷变于夏。因此，华夷之别也无妨说是文野之别。日韩越各国，自古受儒学的熏陶，此种华夷观念，自不免引起他们强烈的反应。日本于8世纪初设立太学后，不久就以“中国”自尊其国，而视落后的虾夷、隼人为夷狄，如藤原广嗣的表文云：“北狄虾夷，西戎隼俗……往古以来，中国有圣则彼服，朝廷有变则先叛。”类此史例，不胜枚举。甚至反过来，不以自称“中国”为满足，而以唐朝与高丽等并称为“诸藩”。此种贵内贱外的思想，愈演愈烈。江户时代，浅见纲斋竟宣称是唐朝的圣人，故以日本为夷狄，如果是日本的圣人，必以日本为中国，而以唐朝为夷狄。直至美国打开日本门户，明治天皇仍不忘颁诏叮咛史官“明华夷内外之辨”。至于韩国，自古以中国文化继承者自居。新罗为了迎头赶上先进国家，首先谋求“以夷易华”，衣服改从华制。高丽先后为契丹、女真、蒙古征服，虽屈于威力服从一时，但自负文化水准较高，始终目彼等为夷狄，心存藐视，而对于宋室，却表示由衷的悦服。李朝尤严华夷之辨，自称为“小中华”。对中国始终自视如周之诸侯，仰奉明室如周之天子，而以女真目为“野人”，后来满族兴起，初亦视为“胡虏”，极端敌视，及清朝取得中国文化保护者的地位，朝鲜终于亲清有如亲明一般。朝鲜亲华态度如此彻底，完全由于文化认同的结果。越南方面，正史可考者，越人以“中国”自尊其国，始于13世纪的陈朝，当时蒙古一再入侵，陈王檄责诸将有云：“汝等为中国之将，侍立夷首，而无忿心。”自此越人的民族意识日益昂扬。明廷平黎季犛之乱后，在越重置郡县，黎利奋起抵抗，一再发布檄文，斥明为“贼”，自称为“中国”。不久，明军退出，黎朝成立，上表明廷，又称明为“中国”为“华”，可是对于其他邻邦，越南却又自居为“华”为“中国”，而目那些邻邦为“夷”为“蛮”，并自称“统御华夷”。黎朝之后的阮朝，其立国虽多少得助于法人，但其对西人的态度，仍保持过去对夷狄的传统，越王曾一再告诫“严内外之防”。可见春秋辨华夷的观念，影响各国如何深远。

第三编政治，包括论文三篇，分别检讨中国文化对日韩越各国的开国传说有什么影响，中国历代政权转移引起日韩越各国政局如何的变化，中国政治制度引起日韩越各国如何的模仿。

就日韩越开国传说言，当日韩越各国还在草昧未开状态时，中国文物制度已粲然大备，所以各国都采中国的传说或史实，以编造其开国传说。日本方面，如神武开国传说中的诸神，与我先秦的社稷五祀和齐国祀典中的八神差不